

THE ECOLOGICAL TUR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主编 杨通进
杨通进 高予远/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杨通进,高予远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
ISBN 978-7-5366-8496-6

Ⅰ.现… Ⅱ.①杨…②高… Ⅲ.生态环境—环境保护—影响—可持续发展—世界—文集 Ⅳ.X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732 号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
XIANDAI WENMING DE SHENGTAI ZHUANXIANG
杨通进 高予远 编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 玮
责任编辑:刘 玮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31 字数:433 千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册
ISBN 978-7-5366-8496-6
定价:54.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丛书顾问　[美]Holmes Rolston(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编委会主任　　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会副主任　王耀先(原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司)
　　叶　平(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国聘(南京林业大学)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澳大利亚]Andrew Brennan(La Trobe University)
[美]Dale Jamie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澳大利亚]Ferya Mathews (La Trobe University)
[英]Robin Attfield(Cardiff University)
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
王建明(苏州科技学院)
卢　风(清华大学)
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
苏贤贵(北京大学)
肖　玲(南京大学)
佘正荣(广东行政学院)
郇庆治(山东大学)
曾建平(江西师范大学)
韩立新(清华大学)
雷　毅(清华大学)
谢扬举(西北大学)

目　录
CONTENTS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总序 /1
导论　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　/ 1

第一部分　生态世界观 / 11
第一章　自然之死　［美］卡洛林·麦茜特 / 17
第二章　深层生态学: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新哲学吗
［澳大利亚］W. 福克斯 / 41
第三章　深层生态学运动:一些哲学观点　［挪威］阿恩·奈斯 / 50
第四章　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
［美］C. 斯普瑞特奈克 / 67
第五章　生态学、科学和宗教:走向一种后现代世界观
［美］小约翰·B. 科布 / 79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　余谋昌 / 96

第二部分　生态伦理 / 109
第七章　伦理学的扩展与激进环境主义　［美］R. F. 纳什 / 114
第八章　驳人类沙文主义
［澳大利亚］理查德·罗特利　薇尔·普鲁姆德 / 125
第九章　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澳大利亚］彼特·辛格 / 154
第十章　关于动物权利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
［美］汤姆·雷根 / 167

第十一章　诗意地栖息于地球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 182

第三部分　生态神学 / 201
第十二章　对上主所创世界的照顾与责任
［德］卡尔·白舍客 / 205
第十三章　地球的毁灭与解放:生态神学　［德］莫尔特曼 / 226
第十四章　新教神学与深层生态学　［美］约翰·科布 / 245
第十五章　过程思想:是一种新的基督教自然神学吗
［美］詹姆斯·C. 利文斯顿 / 262
第十六章　宗教与生态关怀　赖品超 / 274

第四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 287
第十七章　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与可持续发展　蒙培元 / 292
第十八章　人类中心论与民胞物与说　张世英 / 304
第十九章　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　［美］杜维明 / 314
第二十章　生命本位与自然关怀——道家生命观的基本特征及其生态学意义　李　霞 / 328
第二十一章　天地无人则不立,人无天地则不生:论道教天人关系
陈　霞 / 338
第二十二章　佛教的生态观　魏德东 / 355

第五部分　生态政治与生态文明 / 373
第二十三章　生态社会的价值观　［美］丹尼尔·A. 科尔曼 / 378
第二十四章　生态社会主义　［英］戴维·佩珀 / 399
第二十五章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生态主义
［英］安德鲁·多布森 / 420
第二十六章　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
［荷］沃特·阿赫特贝格 / 439
第二十七章　走向稳态经济　［美］赫尔曼·E. 戴利 / 454

人名对照表　/ 47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uanjing Renquan

总 序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个幽灵在地球上四处漫游。这个幽灵就是生态危机。

20 世纪后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人类在全球范围采取了大规模保护环境的措施，试图赶走这个幽灵。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像一个吃饱喝足了的吸血鬼，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难以对付。

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翻阅手边的报纸或杂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听到或读到关于这种或那种全球环境问题的报道，例如：温室效应，物种灭绝，森林锐减，能源短缺，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

困扰全球的这些环境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国。事实上，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 20 多年经济又持续高位增长，因此，我国的环境所承载的压力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得多，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也比大多数国

家严峻。长期的污染和破坏已使我国的生态系统变得非常脆弱。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7米,面积缩小了312平方公里,面临着变成死湖或沙湖的危险。举世闻名的甘肃敦煌月牙泉在20世纪70年代占地22亩,水最深处达9米,但目前水域仅有8亩,水深不足3米,如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30年后月牙泉将不复存在。长江目前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这些都是我国生态系统陷入危机的重要信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指标和其他许多社会指标年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环境指标却年年欠账。“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成了我国年度环境报告的惯用语。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却每况愈下。“局部改善,总体恶化”也成了全球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环境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如果说过去50年多年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提供了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这就是: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工业文明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产权不清和企业成本的外部性。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不外乎两条:自然资源私有化、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有机的生态系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分给每一个人;环境要素的边界与产权的边界不可能正好重叠,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努力也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环境污染具有滞后性,政府和企业很难在企业开始运营前就准确地计算出清理该种污染所需的费用。不同企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污染合在一起,会产生累积和扩大效应,这种效应导致的环境后果很难评估。对自然物品的定价涉及代际偏好的比较问题。当代人给自然物品的定价难以反映后代人的意愿,这对后代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把

所有的自然物都加以定价,意味着把所有的自然物都当成可以买卖和替换的“资本”。这是对自然的严重曲解。

工业文明的政治理念难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支持。工业文明的民族主义理念赋予了每一个国家独立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绝对权利。但是,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全球范围采取共同行动。环境保护的世界主义诉求会遇到来自民族国家的强烈抵抗。代议制民主也会遇到来自企业和选民的压力。作为组织良好的院外压力集团,企业会对政府的环保立法百般阻挠。选民更关心自身的福利水平,对政府那种旨在关心遥远后代生存环境的动议往往不以为然。被选出来的所谓民意代表在行使权利时可能也会背叛选民的意愿,与各种利益集团同流合污。

现代科技是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枯竭的速度。但是,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进步给环境保护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已经被人口爆增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完全抵销了。不仅如此,经济学中的“杰文斯悖论”还告诉我们,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还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的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的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事实上,环境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单纯的技术进步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只有制度层面的综合变革才能有效遏制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也不能完全与环保理念协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把自然看成一架没有生命、可任由人类拆解、重组和控制的机器。自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为现代人掠夺自然的行为提供了辩护。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关注的是个体,它对互利和权利的强调很难为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它把幸福理解为个人感性欲望的满足,这导致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根本走不出越陷越深的生态危机。

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何在?

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突显自然的整体性及其内在价值的有机自然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既关注人的权利(特别是普遍人权),更强调关怀与责任,倡导和谐与理性消费。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型。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实现这种变革,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我们希望,《走向生态文明》丛书能够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生态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杨通进

2006 年岁末

导　论

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

对于人类来说,20 世纪是一个沉重的世纪,它见证了太多的杀戮、欺骗和谎言,也许诺了空前的财富、和平与进步。这是一个富裕与贫穷共存、绝望与希望同在的世纪。命运之神时而把人类推向光明与狂喜的山巅,时而又把人类抛入黑暗与悲哀的深谷。面对这种深深的困惑,人类开始了艰难的探索,试图寻找一条新的文明之路。

一、生态视野中的人类文明史

大自然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它通过进化之手奇迹般地创造出了生命,创造出了人类。和生命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样,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恩惠。但是,人类又是生命进化旅程中一个特殊的旅客。由于他的到来,生命进化的故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大地母亲”的健康也受到了威胁。

人类这种改变地球的命运的能力,是由他们的生存方式、由他们的生存方式所创造的文明决定的。由于生存方式(包括获取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方式)不同,人类的历史又表现为 3 个不同的阶段,即采集—狩猎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和工业文明阶段。

采集—狩猎文明的早期历史大部分都被历史的尘埃掩盖着。我们只知道,大约3 000 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猿类。大约 200 万 ~ 150 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出现了。他们被视为现代人类

的直接祖先。大约 10 万年前,他们进化成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智人”(Homo sapiens)。大约 3 万年前,完全的现代人(Homo spiens)开始在世界各地遍布开来。

采集—狩猎文明是人类初期的生存方式。以直接利用自然物为特征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是人们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活动的成果,主要依赖于盲目的自然力。在采集—狩猎文明阶段,人们生活的群体规模一般都很小。他们大都居住在山洞中,通过收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和打猎获取生活资料。当在一个地方寻找不到足够食物的时候,他们就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居住。那时的人类主要靠自然的“恩赐”而活着,基本上没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因此,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主要是敬畏。他们确实是轻柔地踏在地球上。除了脚印,他们没有在大地上留下任何痕迹。

大约 1 万年前,人类告别了原始社会,跨入了农业文明阶段。以利用和强化自然过程为特征的农耕和畜牧活动,是农业文明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历史的第一次大转折。朝向农业的转变、定居社会的增加、城市的出现、手工业的分工、强有力的宗教和政治人物的诞生——都是这种转折的重要标志。

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农业文明的第一批花朵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文明)和埃及(埃及文明)开始绽放。此后不久,印度文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中华文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玛雅文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等也相继在世界不同区域开花结果。

农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两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定居和人口的增长。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和燃料,人们开始大面积地砍伐他们周围的森林。这不仅减少了生物多样性,改变了许多物种在地球上的分布,还破坏了地表植被,改变了生物圈的面貌。为满足稠密的人口对食物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过度耕种,过度放牧。这导致了草场和耕地的退化。沙漠化和盐碱化接踵而来。文明的故乡最终演化成了文明的墓地。

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被茂盛的森林和草原覆盖着。然而,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汉谟拉比王朝开始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肆砍伐两河流域上游的森林。失去了森林的护卫,上游的水土开始大量流失。日复一日,河流携带的泥沙淤积在河流入海处,河床越来越浅,地下水位抬高,地下水中的盐分随水上升到表层土壤,土质逐渐盐碱化。同时,由于失去了森林的屏障,沙漠开始大举推进。于是,千里沃土的巴比伦王国最终变成了不毛之地。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也重复了巴比伦文明的宿命。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生存并没有受到全局性的影响。人类的文明之花依然继续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其他地方继续开放。华夏文明更是一枝独秀,延绵不绝。个中原委主要在于:(1)人类掌握的破坏地球的能力还相当有限,人类的破坏行为还没有危及地球自身的生态平衡;(2)人类的人口数量还没有超过地球的承载极限(例如,公元前 500 年,地球上的人口只有 1 亿,公元 1300 年达到 3 亿,到了 1700 年也只有 4 亿);(3)人类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念。

大约在 18 世纪,人类文明首先在西欧步入了工业文明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次巨大转折。工业生产(包括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是工业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其基本特征是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改造和驾驭自然过程,制造出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产品。征服和统治自然,这是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大城市的崛起、城市化浪潮、人口暴增、快捷的交通、消费社会、依赖于以矿物燃料为主的能源体系——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重要特征。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文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丰富。借助于强大的科技力量,人类不仅使自己的足迹撒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还把探索的计划延伸到了太空。然而,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工业文明向自然吹响的进军号角,却变成了向人类文明敲响的警钟。

二、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

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人类环境危机。这次危机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化学物品污染,以及噪声、电磁波等物理性污染。许多著名的环境公害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面对这一问题,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采取了环境保护的措施,使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或解决。

然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类环境危机。与第一次环境危机相比,第二次环境危机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五六十年代发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污染故事,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上演;环境危机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全球蔓延。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均受到污染,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的北京、天津、沈阳、太原、兰州等城市"榜上有名"。我国2/3城市陷入垃圾重围之中。

第二,资源短缺(如生产生活用水短缺、耕地短缺、能源短缺和矿产资源短缺等)问题开始凸现。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爆发。许多国家的近海渔业资源开始枯竭。目前世界上60%的地区和国家面临淡水不足。我国人均拥有的淡水量是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4,北方地区是1/8,西北地区是1/16。我国人均森林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6。

第三,人口暴增。1850年,世界人口仅为10亿。110年后,这一数字上升为30亿。1980年,世界人口升至40亿。1987年7月11日,人类迎来了"50亿人口日";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跃升至60亿。暴增的人口无疑使资源短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和难以解决。我国人口目前已超过12亿,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在迈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这一沉重的人口负担还将继续"述说艰难"。

第四,全球生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对土地的过度开垦和放牧导致了全球土地荒漠化趋势的加剧。目前,世界约有29%的土地受到沙漠化的威胁,每年约有2 000万公顷土地沙漠化。对热带雨林的大量砍伐和对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导致了大量物种的灭绝和生物多

样性的锐减。据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估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 5 万个物种灭绝。未来 50 年内,地球上还将有 1/3 的物种灭绝。物种的大量灭绝和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不仅会使人类丧失许多珍贵的食物和医药资源,还将使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变得脆弱不堪。臭氧空洞和温室效应的加剧也将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因此,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看,第二次环境危机都要比第一次环境危机严重得多。这种危机不再是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危机。它们对作为人类文明生存母体的地球本身构成了威胁。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三、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

在沉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文明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是沿着工业文明的轨迹继续发展,把人类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置于某种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中?还是寻求新的更为安全的发展模式,使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余生命都能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面对这一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人们开始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们逐渐从观念、制度和政策层面选择了一条力图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

首先,生态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先导和重要标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20 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法国思想家史怀哲(1875 ~ 1965)就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全新理念,认为善的本质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1947 年,美国林学家 A.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 ~ 1948)在《沙乡年鉴》一书中提出了从伦理上关心地球的“大地伦理学”,把“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的道德标准。他们的思想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环境伦理学,为现代人理解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对于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者来说,R. 卡逊(Rochel Carson)于 1962

年出版的献给 A. 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寂静的春天》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化学农药给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并向"征服自然"这一流行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卡逊提醒人们说,人类管理和控制自然的日益增长的能力是一柄双刃剑。"人类除非接受史怀哲提出的直接关心所有创造物——真正敬畏生命——的道德,否则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把大自然中的各种创造物仅仅视为可供人类驱使和消费的物品是错误的;人类应当与昆虫和睦相处。作为限制高度技术化了的人的文化设计,环境道德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卡逊还指出,人类的文明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我们正在其上高速行驶的工业文明之路,虽然被"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但"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只有"另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才能给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提供希望。卡逊虽然没能告诉我们,这"另外的一条路"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但她的思想却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指明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方向。

1968 年,一个"以推动人类采取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应对人类困境"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在罗马成立。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指出,由于工业化的速度、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是以指数的形式在增长,因而人类的发展将在 21 世纪的某个时候达到地球的极限;届时,全球的经济增长将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为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人类应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统一而协调的行动,"有控制地、有秩序地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全球均衡发展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要把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的承载极限的范围之内;二是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这实际上是要求人类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的最早呼唤之一。此后,罗马俱乐部又发表了一系列报告,进一步阐述了该俱乐部对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被许多人冠以"悲观主义"的标签,但是,正是这些警告唤醒了人们的忧患意识,促使人们采取了许多积极的应对措施,从而避免了许多悲剧的发

生。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困境的深层原因的思考、它的关注“问题群”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它的关于“价值观的改变是人类走出目前的困境的关键因素”的论述,为人们构思可持续发展道路和生态文明模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其次,在联合国和全球层面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保护环境、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努力,是人类实现文明的生态转型的重要信号,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人类已经意识到了实现文明的生态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实践上看,这次会议唤起了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面对全球环境挑战的号角。从理论上看,这次大会发表的两份文件(《人类环境宣言》和由沃德、杜博斯主编的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提出了许多对建设生态文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1)在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孕育着所有的生命;这个地球是人类共有的,也是唯一的家园。(2)整个生物圈既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又是脆弱的。目前,人类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深度对大自然进行改造。由于无知或麻木,这种改造正在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害。(3)历史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为了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幸福,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要把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当做一个紧迫的目标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全球性的解决办法,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4)对于地球上的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来说,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各国必须努力在有关国际机构内就消除和彻底销毁这些武器达成协议。环境问题与和平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把它们当做一个整体来加以解决。

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环境保护的专门机构,加快了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措施。1973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1982 年,为纪念人类环境会议 10 周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了内罗毕会议,发表了《内罗毕宣言》,重申了《人类环境宣言》的基本精神,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采取行

动,保护我们这颗小小的星球。

1987 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亦称布伦特兰报告)深刻地指出,人类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应是一条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即“可持续发展道路”。布伦特兰报告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三大主题(和平主题、发展主题、环境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做一个更大的和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工业文明的生态困境的有效途径。这份报告还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对环境的保护视为“我们对其他生命和子孙后代在道义上的义务的一部分”,实现了环境伦理观上的革命变革。因此,布伦特兰报告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

1991 年,由中国发起并在北京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北京宣言》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方面所承担的共同的,然而又是有差别的责任。同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也发表了一个重要文献:《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这份报告的独特之处是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战略:(1)努力使一种新的道德——可持续生存的道德——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深刻的支持,并将其原则转化为行动。(2)将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其中,对“可持续生存道德”的强调,是这份报告的一个独特贡献。从总体上看,这两个文献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布伦特兰报告的基本思想,为使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生态文明思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 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前者本着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以保护地球永恒的活力和整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